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5.3

一年出版4期，以16種語言刊出

權力與原則

Walden Bello

社會科學與民主

Dipankar Gupta

照顧工作論壇

Brigitte Aulenbacher, Michael Fine, Hildegard Theobald, Yayoi Saito,
Roland Atzmüll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Birgit Riegraf, Monica Budowski,
Sebastian Schief, Daniel Vera Rojas, Elena Moore
and Jeremy Seekings

今日的社會學

- > 俄羅斯社會學的新方向
- > 捷克社會學的冒險
- > 世界規模的社會科學
- > 國際視野下的專業
- > 謝謝，Nacho！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5卷 / 第3期 / 2015.9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邁向公共、邁向比較

在這期的《全球對話》我們從兩篇亞洲的文章開始：一篇是菲律賓、一篇是印度，分別是由兩位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撰寫的。Walden Bello 和其他參與政治社會學者類似，例如《全球對話》訪問了 Henrique Cardoso，巴西的總統（《全球對話》3.4 期），以及 Nicolás Lynch，秘魯的教育部長（《全球對話》4.2 期），Bello 描述了在代表政黨 Akbayan 和個人信念之間的緊張關係。他是一位全球發展的重要作者，也是菲律賓共產黨員，並且長期以來對抗世界銀行和 Marcos 獨裁之間的共謀。而印度社會學家 Dipankar Gupta 則是另外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也是傑出的學者，在發展組織和國家委員會裡面擔任要職，讓他更接近權力核心進行觀察。他闡述了民主與社會科學的關係。

我們也跟著這些公共參與的腳步，探討了這個時代最重要但是社會學家長期以來沒有太重視的議題：照顧與照顧工作。Brigitte Aulenbacher 把多篇文章彙整起來，比較了兒童和老人照顧的市場化分別在澳大利亞、德國、瑞典、日本、西班牙、澳洲、智利、哥斯大黎加、南非等國。很高興可以看到 ISA 研究委員會的重要比較成果。

而另外兩篇年輕學者的文章是關於俄羅斯的社會學。公共社會學實驗室挑戰了兩個傳統：「工具主義」的政策研究，由國家和企業精英所主導，以及專義社群「自主主義」，滑進私有的無關痛癢研究之中。該實驗室追求第三條路，就是批判介入，建立和公民社會的合作，並且不犧牲科學的嚴謹。第二篇俄羅斯的文章是一個圖文報導，探討 St. Petersburg 的建築如何體現了早期蘇維埃時代社會主義的理想。現在是時候讓年輕一輩的社會學家去復甦那個既偉大又悲劇的 20 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想像了。

我們還有來自捷克的有趣文章，分別是捷克在英國的幫傭移民，以及 Roma 移民的展覽，還有在家教育的處境。另外也有對於專業的社會學討論，以及世界規模社會科學之探討。最後，我們要跟 José Ignacio Reguera，人稱的 Nacho，說聲再見。他是 ISA 辦公室 30 年的資深員工，默默地幫助這個組織順利進入 21 世紀。同時，我們也歡迎印尼的編輯團隊，這讓《全球對話》擴充到了 16 種語言。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Walden Bello 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菲律賓社會學家。他反省了參與政治的挑戰和失望，解釋為什麼要辭掉國會議員一職。



Dipankar Gupta 是印度的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檢視社會科學和民主的關係。



Brigitte Aulenbacher 是奧地利的社會學家，把許多全球對於照顧工作的文章集合起來。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Gay Seidman.

副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i,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ohsen Rajabi, Faezeh Esmaeil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hiro Matsuda, Fuma Sekiguchi, Taiki Hatono, Hidemaro Inouye, Shinsa Kameo, Kanako Mataka, Shuhei Matsuo, Kaho Miyahara, Noriko Nishimori, Shintaro Oku, Fumito Sakuragi, Yutaro Shimokawa, Mayu Shiota, Masaya Usui, Tomo Watanabe.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anova, Daurenbek Kuleimenov, Ramazan Salykzhanov, Adil Rodionov, Nurlan Baygabyly, Gani Madi, Galimzhanova Zhulduz.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Mariusz Finkielsztej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Martyna Maciuch,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Costinel Anuța,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Alexandru Duțu, Irina Cristina Făinaru, Ana-Maria Ilieș, Ruxandra Iordache, Gabriela Ivan, Mihai-Bogdan Marian, Anca Mihai, Adelina Moroșanu, Monica Nădrag, Radu Năfornită, Oana-Elena Negrea,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L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Jing-Mao Ho.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編輯顧問: Ana Villarreal.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邁向公共，邁向比較 2

權力和原則：一個社會學家在國會的起落

by Walden Bello, 菲律賓

4

社會科學和民主：選擇性親近

by Dipankar Gupta, 印度

8

> 國際視角的照顧工作

全球視野的照顧工作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奧地利

11

在澳洲把照顧工作重構成為市場經濟

by Michael D. Fine, 澳大利亞

13

長期照護：德國和日本的比較

by Hildegard Theobald, 德國, Yayoi Saito, 日本

15

澳洲和德國照顧工作的變遷

by Roland Atzmüller, Brigitte Aulenbach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奧地利, Birgit Riegraf, 德國

17

危險環境下的的家庭照顧：智利、哥斯大黎加、西班牙

by Monica Budowski, 瑞士; Sebastian Schief, 瑞士;

W. Daniel Vera Rojas, 智利

20

南非照顧工作的限制

by Elena Moore and Jeremy Seekings, 南非

22

> 俄羅斯社會學新方向

充滿敵意環境裡的社會學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俄羅斯

24

早期蘇維埃建築的社會主義理想

by Natalia Tregubova and Valentin Starikov, 俄羅斯

26

> 捷克的社會學冒險

幫傭移民作為成年禮

by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捷克

29

在家教育：捷克教育的自由和控制

by Irena Kašparová, 捷克

31

在捷克記得Roma工人

by Kateřina Sidiropulu Janků, 捷克

33

> 特輯

世界規模的社會科學

by Ercüment Çelik, 德國

35

國際視角下的專業：打開黑盒子

by Ellen Kuhlmann, 瑞典; Tuba Agartan, 美國; Debby Bonnin,

南非; Javier Pablo Hermo, 阿根廷; Elena Iarskaia-Smirnova,

俄羅斯; Monika Lengauer, 德國; Shaun Ruggunan, 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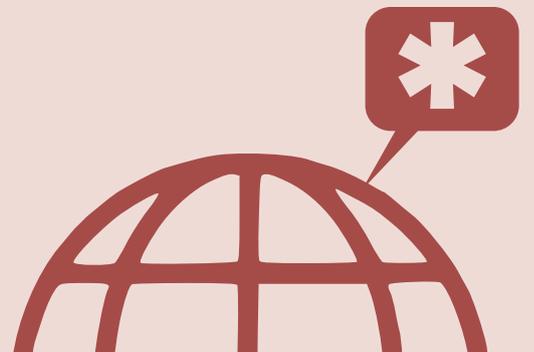
Virendra P. Singh, 印度

37

謝謝，Nacho!

by Izabela Barlinska, 西班牙

39



> 權力與原則

一個社會學家在國會的起落

by Walden Bello, 退休教授,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t Diliman, 前菲律賓眾議員, 2009-15



Walden Bello 是一位菲律賓社會學家，國際上相當有名，也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出版的書籍主要是關於發展的政治，包括了 *Anti-Development State* (2004), *Food Wars* (2009) and most recently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2013)。除了是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的教授之外，他也負責了一個在美國為主的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Food First) (1990-94)，同時也是 Bangkok 為主的機構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的創建者。他也是世界上報紙專欄的常客，也是許多國際獎項的獲獎者，包括了 Right Livelihood Priz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和國際學術學會的傑出公共學者獎。這裡他敘述了社會學家參政的難題。他是菲律賓反對黨 Akbayan 的一員，也是眾議員。他也是 ISA 世界大會的 (2014 年橫濱) 全體場次演講者。這篇文章的全文可在 Global Express 上找到。(註 1)

Walden Bello.

我生命中大多時候是社會學家和社運者。在 1975 年的時候，我是 Princeton 的社會學博士，然後立即投入成為全職的行動者，並且推翻了 Marcos 的獨裁政權，成為了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的國際分支成員，然後激進反對全球化。從 1994 到 2009 年，我在 Diliman 的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教社會學。2009 年，我成為了一個菲律賓進步政黨的成員，並且是眾議員。

我所屬的政黨叫做 Akbayan，是一個 1998 年成立的進步政黨，到 2009 年為止。它透過國會的法案，包括生育健康法案、農業改革法案、反對歧視 LGBT 法案、海外的菲律賓人投票權、公安法案、社會住宅提供給都市拼窮等等，展現出相當的進步性。

2009 年，該政黨辯論是否要支持 2010 總統大選的 Liberal Party (LP) 的候選人，這是一個關於候選人是否有辦法執行改革政綱的辯論。雖然 LP 的候選人應該不可能推動財富重分配、參與民主、或是國家安全，許多我們政黨的支持者都認為 LP 會帶來好的治理和反貪腐。這是一個人民強大的訴求。

雖然說當 LP 的反貪政綱相當明確，我們也期望他們的候選人可以在其他議題上也有明確的進步性，像是生育健康和農業改革。2010 年之前，長期辯論的生育健康法案變成了立法討論的核心，可是最近剛通過的農業改革法案那時候卻還在等待被注意到。此外，我們希望可以推動其他關鍵的議題，包括獨立的外交政策，反對自動接收法案，此法案優惠外國和本國的債務。並且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財金、投資法案。

LP 的候選人 Benigno Simeon Aquino III 是前爭議性總統 Corazon Aquino 和烈士 Benigno Aquino 的小孩，他在 2010 年勝選了。而後來的 5 年來，作為 Akbayan 的立法者，我有第一手的交手經驗，以機會觀察那些由自由派和傳統派政治人物所聯合把持的國會如何把機會給了進步政黨。

> 在文化前線的勝利

菲律賓的進步派已經長期以來尋求政府支持的家庭計劃方案，好去處理貧窮和女性生育健康的問題。2010 之前，當新的政府上台之前，我的黨和其他進步派已經讓生育健康法案在議會之中持續了 12 年。儘管從羅馬天主教來的強力反對，進步派已經建立了多階級的連線，重新從女人的生產權利和健康的角度去做。這是一個獲勝的論述。2012 之前我就成功聯合了保守組織和統治精英，還有中產階級，於是法案通過了。

> 農業改革：階級的困難現實

然而農業的改革證明了聯合政治的困難，特別是遇到階級利益的時候。雖然土地改革的努力可以被追溯到早期的 1960 年代，但是不平等依舊存在。在 1970 年代，Marcos 獨裁的土地改革面臨了地主的強烈抵抗，所以暫停了。在 1986 年 Marcos 被推翻之後，Corazon Aquino 的政權進行了一個很有野心的計畫，要重新分配 10.3 百萬平方公頃的土地，是為了回應 New People's Army 的農村起義。可是，國會被地主把持，讓法律有漏洞，所以重分配只限定在公共土地。所以那些很有價值的私人土地都沒有被動到。

在我在國家的第一年裡面，Akbayan 成功地資助了一個新的農業改革法 (CARPER)，提供了足夠的資金給土地徵收和解決法律漏洞的改革。這個法案之所以會通過是因大地主的國會議員有些死掉了，而且人民訴求農業正義的運動又起來了，有農民組織遊行了 1,700 多公里，從 Mindanao 島到總統官邸。

可是即使有法律通過了，政治意志還是要有，才可能實行。從法律通過之後，總統就忽略而且不想面對地主，讓 700,000 多平方公頃的合格土地無法運用，那些包括了這個國家最好的土地。所以農業改革停止了，是因為地主反抗、總統忽略、官僚無能所導致。而總統對改革的忽視也是 2015 年三月辭職下台的原因之一。

► 良好治理的失敗

讓我最後談談我的政黨經驗。關於良好治理，LP 所作的承諾對於打擊貪腐來說是很認真的，這也是位什麼我們願意參加他們的聯盟的原因。可是這也是讓我辭職的原因。

Aquino 政權的前五年就是要求有良好治理的。作為 Akbayan 的主要議員，推動這個改革當然是很棒的，也包括了起訴前總統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的貪污。而 2013 年 5 月的選舉被很多人包括我在內詮釋為是對於自由派的信任投票。

可是蜜月期並不久。菲律賓的政治系統有一項被稱為「pork barrel」或是「Priori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PDAF) 的制度，也就是從美國殖民時期就存在著的制度，就是總統分配一些資金給國會議員去推動他們的計畫。後來我馬上發現到一位很擅長這種政治技巧的 Janet Lim-Napoles 設立了一個假的組織，為的是可以得到這個資金，然後為自己做事。這個案例讓許多人起了反對聲浪，要求取消 PDAF。我深信我的黨會堅守原則，要求取消這個制度，拒絕總統的資金。可是我的這個意見被否決了。

很快的又有另外一個醜聞爆發，是關於總統數百億的資金分配制度：Disbursement Acceleration Program。這個不透明、不負責、不謹慎的公共資金制度讓該政府做了其之前指控前政府不該做的事情。而當最高法院認定違憲時，我認為總統該做出決定了。

當我要求我的政黨去問總統是否要求相關政府官員下台負責的時候，有些黨員反對，認為這只會讓總統更加頑固，我覺得這是一個進步政黨能想出來的最爛理由了。我認為這個政黨領導階層無法再帶領這個政黨了，所以我寫信給總統，從一個公民的角度去要求總統開除預算部門的首長，「因為這樣快速但粗糙的資金操作太過分了！」我也認為，這個制度開啟了「總統的恩辟侍從管道，違反的憲法的權力分立原則。」因為「行政部門直接分配資金給國會。」

我的信引起了領導階層的緊張。許多成員認為我沒有權利私自寫信給總統，因為作為黨員，個人意見本來就是一種該取捨的東西。這是黨的高層這麼說的。

當我們內部的辯論持續時，政府歷經了第二次是敗：2015 年 1 月 25 日，在 Mindanao 的反恐任務變得警戒，也讓國家的霹靂小組的 44 位成員死亡，加上 18 個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分離主義的成員的死亡。政府曾經和該組織協商過自治協議。

「Mamasapano raid」代表了壞治理的案例。第一，總統拒絕負起責任，這違反的總統的領導原則。第二，他違法命令已經因為貪污而被暫停值勤的國家警察。第三，他的命令以美國的利益為主，而不是菲律賓的利益優先。所以我為了良好治理，我要求總統負起全部責任。

當政府的正當危機越來越嚴重時，我要求 Akbayan 要推動改革。而當總統在一個很弱的道德地位時，我認為我們應該給他壓力，負起責任，並且解除那些貪腐無能官員職位，要推動良好治理的政綱。可是我的政黨的領袖拒絕了。

若是沒有辦法把要求總統改革貪腐的責任扛起來，那我也不想代表這個政黨了。

所以我認為黨的高層是錯的，我也不需要為這個黨背書，我也不同意該黨立場，也不支持總統。沒有人要求我辭職，可是黨的規則很清楚。我在 2015 年 3 月 19 日辭職。

► 主要課題

透過這些敘述，我已經強調了我追求 3 個目標所學到的事情：生育健康、農業改革、良好治理。

而生育健康的努力解釋了文化課題提供了一個進步政綱可以推展的場域，並且可以透過結盟和論述策略達成。在家庭計劃的那場戰役中，支持生育健康的力量得以開啟上層和中產階級的罅隙，這是透過用女性生產權利的論述取代人口控制的論述，開啟了通過法案的大門。

農業改革的經驗則提醒了我們要透過

>>

非革命的的政治氛圍下去對於結構性不平等的有效打擊是多麼困難。雖然進步力量已經試圖去形成有利的立法結盟，但是農村的不平等仍然很嚴重，這是因為總統的忽略、官僚的膽怯、以及地主的反抗。

第三個例子，就是爭取良好治理，雖然有著痛苦的個人和政治結果，但也幫我上了一堂課。其中一堂課就是結盟是動態的，在這個個案中，結盟改革會變成其他的東西。第二是進步的政黨必須繼續評估其結盟的參與，任何利益相關的政黨，包括執政黨，其利益都會相互衝突，所以在每一個關鍵點，政黨都要再評估結盟，看看根本的價值有無相互衝突。

第三堂課：有時候，在政黨意見和其

國會代表意見是會不一樣的。這裡，進步派必須遵守良心，甚至要反對政黨的領導。作為進步派意味著要去想像一個平等、政治、團結、主權的社會，並且有一個政治綱領去實現這些目標。但是也意味著佔據一個道德的立場。或許一個進步派的政治人物最特別的就是其道德行為。對我來說，作為一個進步派是守住原則和價值，即使位置、財產、生命受都威脅，都不退縮。■

來信寄給 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註 1：<http://isa-global-dialogue.net/power-and-principle-the-vicissitudes-of-a-sociologist-in-parliament-july-4-2015/>

> 社會科學和民主

選擇性親近

by Dipankar Gupta, Shiv Nadar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註1)



Dipankar Gupta.

Dipankar Gupta 是一位傑出的印度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他現在也是 Shiv Nadar University (位於 New Delhi) 的公共事務和批判理論中心的執行長和教授。在將近 30 年來，他都在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教書，而且著作等身，編輯和寫作有 18 本書，並且觸及了各種印度後殖民轉變的議題。他最近的書：《從上而下的革命：印度的未來和公民精英》認為民主的前進是透過由上而下的介入得以可能。他也是 The Times of India 和 The Hindu 的專欄作家，並且也透過種種管道參與公共事務，包括了 Reserve Bank of India 的執行長和 National Bank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的執行長。他也是 Toronto, Paris, 和 London 等地的訪問學者，並且到過美國多所大學擔任資深研究員。2010 他獲頒法國政府的 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榮譽。這篇文章的完整版可以在全球對話上找到。(註 2)

你有想過，為什麼包括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只會在民主社會裡面茁壯嗎？有些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像是沙烏地阿拉伯、中國、俄羅斯等，他們有很強的自然科學，可是社會科學卻不是很茁壯。中國和俄國的電子、物理、醫學、交通等很先進，可是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甚至歷史等，都落後許多。只有民主國家會擁有強大的社會科學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

有些人會說民主和社會科學的選擇性親近性有個膚淺的驕傲，那就是這其實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或許社會科學只有在歐洲或北美才是個中立學科？許多非西方的社會科學批判家推

動本土的類別，對抗霸權的社會科學。但是這樣的方法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科學發展不過是最近的事情，在美國和歐洲也是如此。這些知識系統對於他們來說也曾經是新的，並不是從中古世紀所傳承下來的。

在民主時代以前，追尋社會科學的條件並不存在。資料也沒有，不論對於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來說，都不可能形成。社會科學是在新的脈絡下誕生的，只有新的事實變得相關之後，才得以可能推動了社會科學的形成。

只要知識包括了從上而下傳授來的信念，不論教堂或是國家，世俗主義是不可能的，直

>>

到了人們可以問：「在我相信你之前，先證明給我看」，社會科學才得以可能，所以世俗主義是關鍵，因為研究人們的行動。生活不是固定不動的，因為脈絡不同，地域和歷史也都不同。自然科學有更多的自由，譬如說水可以止渴，彩虹在天上，而火則帶來煙和光。這些都不需要民主，也不會變。但是社會科學並非如此。

對於社會科學來說，去解釋我們的發現，並且了解其他人怎麼影響我們，甚至定義之，這些都是相關的，不，是基本的！這個觀點是很重要的，而且在過去並不存在。早期，社群、群體、村落、階級、血親等等，都住在一起，但是沒有所謂的社會。廣大且規律互動的情形，並且超越原始的社會連帶，這是很根本的社會科學問題，並且也是歷史上新的事件。社會到來之後，我們不再可能用以前的組織原則區區分人群，我們也了解「他者」變成了重要的一環，甚至是我們自身重要的一環。

在民主國家中，這樣的體認變成了非常重要。政策或是經濟的方案都要考慮到多重的利益，甚至那些最弱勢的群體。英國的 1834 貧窮法案是建立民主社會的重要一步。這意謂著勞工不再和破爛的房子綁在一起，可以自由移動去找工作。

民主在一個新的宏大的事實上面。從一開始，我們開始去接受人類做為一個理性目標追求者，可以自由選擇。有了選擇，就有錯誤，錯誤是學習的代價，因為有錯誤才有創新。

這意味著什麼？當個體的錯誤沒有被處罰的時候，那就有改進和創新的空間。弱勢民主的法則沒有被違反，錯誤是受到歡迎的。民主給予了許多條路，允許不同的方式，像是教育孩子、婚姻生活、選擇職業、交友等。過去這些選擇都不存在。但是在民主社會，甚至那些保守的人都要節制其原始的衝動。

經過了多次的試驗與失敗，於是組成了社會科學的經驗材料。從個人的觀點來說，犯錯或許是不幸的，但是對於社會科學而言，錯誤是基本的，也讓社會科學家有資料和概念。民主是社會科學的必要條件，因為對錯誤的接受會變成非例外的。

想像你是一個前民主社會的經濟學家，對於所有可行的目標來說，市場是確定的，而買方和賣方在一開始就給定了。中古世紀的「karkhanas」（工廠）生產產品了給一定類別的

買家。需要技巧，但不是企業，也不可能有經濟錯誤。冒險不會發生，因為買賣都是固定的。當土地固定，勞動力也不能移動，位階也一開始就固定，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在那個非民主的時代並不存在，因為沒有「看不見的手」，沒有市場均衡，沒有判斷錯誤，經濟活動也不會變動甚至破產。

然而在多重認同的脈絡中，一個民主國家必須有經濟活動。雖然市場的隱形之手運作著，有時候國家的手也是必須介入，才達到社會平衡。若是政府不做，讓給其他階級或是行動者的利益主導，那麼經濟會更緩慢復甦，這就是顯示了民主中體認到他者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利益交會，而且允許犯錯。

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若沒有預設人會犯錯的話，是不會有現在的經濟學的。現在是量化寬鬆的時機嗎？匯率應該降低嗎？在威權的國家，這樣的問題是不能被問的，因為決策是由上而下。民主國家中，我們總是可以堅持「證明給我看」。

相似地，透過把權威和權力分開來，政治學這些學科也有賴於民主。在過去，掌權者有權力，但是並不一定有權威。但是民主，其他人的聲音必須算進去。所以民主接受利益的多元，這是必要條件。衝突的看法看目標必須在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下表達出來，不論是哪個政黨擁有權威，都不是聽神的、國王的，而是人民的。所以未來勝利，希望得到權威的人必須平衡不同的利益，農業、工業、白領階級等等。所有的類別下面還有次類別，讓那些政治人物必須聽到「他者」的聲音。

對於政治學來說，系統容納人們犯錯和更正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些都需要規則。犯錯會失去權力。在民主國家，那些掌權的人不可以把權力當作給定的，投票可以改變意志，而且也是被鼓勵的。沒有了民主，就沒有選擇，沒有選舉，沒有批判，也沒有反對政府的機會。

社會學主要目標是去理解社會現象，並透過階級、分類、性別、職業群體。社會實踐，像是婚姻，是在真正的實做中或是透過不同的角度去檢視和研究的，像是階級、卡司特、宗教、職業等的影響，這就是一種體認到「他者」而有的問題意識。

對於流行的實在的概念的抵抗，或是說，本質主義，社會學有意識地更深層鑽研了比較方法，研究不同時空的比較案例，讓學者可以

>>

中立且批判。透過比較我們可以研究社會現象的普遍法則，不論是宗教、婚姻，社會偏好，也可以了解社會事實怎麼樣在不同的環境下可能不同。

所以，社會學和民主的連結是很簡單易懂的：在體認到的「他者」的脈絡之後，這個學科定義了自身，也研究人們跨越文化和經濟的疆界的互動，這就是社會學的特質之一。

在非學術的環境中要如何去問這些問題呢？沒有民主所保障的自由，任何的質問會被認為顛覆性的。民主則可以滋養這些問題，因為是競爭的，也是檢視怎麼滿足各方的利益。

社會學可能有點是行動的，或是讓政策制定者可以推動立即的利益。這是對於這個學科的誤解。但是，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是可以從社會學得利的，若是政策制定者想要一個問題的全部圖像，那麼他們應該借助於社會學。

可是當社會學家像是社會運動者時，他們有風險，也就是讓資料削足適履。社會學可以去問一個整體的改變圖像，也因此會造成許多爭論，反而掩蓋了整個全體面貌。但是社會學家還是可以幫得上忙的，那就是透過想像出一個更包容的社會，產生更多的參與，更大的包容。社會學的核心有賴於人們會犯錯，但是會試著改變，然後追求目標，不被命定。

類似的論證對於歷史和哲學來說也成立。歷史是對現在的迷戀。我們從有限人生的至高點看過去。在民主國家裡，對過去的檢視讓我們可以接受過去的缺點，並且承認過去怎麼影響了現在。沒有這個的話，歷史仍然是無色彩的編年，或是彩色傳記，兩者對於學術來說都沒什麼用。

相似地，哲學被民主的到來轉變了。所謂的「自我」，從笛卡兒到康德，宰制了西方的社會學，也已經挪出一些空間給「他者」，這個轉變不應該被看成是容納，而是組成的，因為今日的哲學很清楚地承認若沒有他者就沒有自我。若是民主意謂著要關心「他者」和允許

錯誤，我們應該談論「公民身份」，也就是民主法律和治理的基石。民主的憲法和懲罰法律是預設「他者」是一個道德行動者，在本體論上和我們類似，也互補。

當「他者」成為了核心的時候，也當對於「錯誤」的接受是常態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是在討論公民身份。社會科學家試圖要強化公民身份，因為這麼做可以鞏固他們的學科。而民主的力量也可以被這個國家社會科學的強弱所判斷。選擇的自由，對錯誤的開方態度，和對他者於我們的影響的理解，這些都是只能給民主國家的公民的。所以，社會科學不可以被看成是西方的或是歐洲的。若有的話，那應該是以公民為中心的學科。■

來信寄給 Dipankar Gupta <dipankargupta@hotmail.com>

註 1：謝謝 André Béteille 教授和 Deepak Mehta 教授的評論。

註 2：<http://isa-global-dialogue.net/social-science-and-democracy-an-elective-affinity/>

> 全球視野的照顧工作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ISA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委員(RC02), RC19委員, 工作社會學委員(RC30), 女性與社會委員會委員(RC32), 第三屆ISA論壇在地籌備委員會副主席(Vienna 2016)



| Arbu繪。

工作的興趣一直在增加，這個主題是一個快速變化的領域，而且社會學家也越來越多人研究這個領域裡發生的多元現象與不平等。

> 照顧的危機和全球的照顧短缺

社會學對於中高收入的國家的研究裡面，照顧的研究反應了在 80 和 90 年代開始，包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在 OECD 國家的實行，以及照顧商品化，另外還有照顧提供在日常生活的挑戰。

一方面，所謂的照顧工作產業正在演變中，而私人的家庭也越來越多僱用移民工作者，特別來自東方和南方的移民。另外一方面，福利國家在南歐和東歐是縮減中的，西歐也是如此，後 2008 的財政掙節開啟了新的照顧危機，這個危機被忽視了，因為照顧和照顧工作總是被社會化所吸收和忽略。

但是中間收入等級的南方

>>

照顧和照顧工作，自我照顧或是照顧他者，在日常生活或是整個生命歷程，家庭或是親屬，專業、國家、市場、公民社會提供照顧服務，這些議題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是至關重大的。

可是長期以來這些議題是被忽略的，或許是因為照顧總是在私領域中是看不見的，或是在公領域中被貶低的，對於性別化和族群化的勞動來說特別如此。

幾年來，社會學對於照顧

國家由於經濟成長讓新的社會服務和福利擴張，照顧工作也被公部門所支持和強化，窮人、小孩、老人、殘疾人士都受惠，並且漸漸擴展到其他人口。

現有對於照顧工作的社會員文獻也指出了這樣的發展，而下列的文章也提供了比較全球北方和南方照顧工作制度的比較與發現。

➤ 全球北方和南方的照顧制度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下面的文章比較了不同國家的經驗，聚焦在私人家庭、親屬、公民社會、國家、市場之間的互動。這些文章提供的了四個觀點。首先，市場化的進行與取向。第二，商品化和去商品化間的複雜關係。第三，照顧商品化不僅對於照顧工作重要，也對照顧提供者和接受者提出了問題。最後，文章都顯示了檢視地方、國家、國際的照顧工作脈絡之重要性。

Michael D. Fine 描述了奧地利的照顧工作制度怎麼在市場化和國家之間被重構。照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以及被照顧者作為消費者，這些怎麼歷經了根本的變遷，在專業化和去專業化之間怎麼樣擺盪。Hildegard

Theobald 和 Yayoi Saito 對於瑞典和日本的比較顯示了國家政策怎麼轉變和採用了新的觀念，怎樣和分工連結。儘管在這兩個國家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是專業的長期照顧在兩個國都被若化的公共照顧服務政策所威脅。

Roland Atzmüller, Brigitte Aulenbacher, Almut Bachinger, Fabienne Décieux 和 Birgit Riegraf 呈現了他們關於奧地利和德國從福利國家到投資型國家的發現，描述照顧工作如何成為一個競爭的場域，如何形塑了移民工，專業照護、社會抗爭和其他的照顧觀點。Monica Budowski, Sebastian Schief 和 Daniel Vera 告訴了我們智利、哥斯大黎加、西班牙的比較結果，敘述了兒童照顧的結構和性別分工，特別是在經濟不穩的家庭內是怎麼被福利國家、市場、家庭、國家的照顧提供者所影響。Elena Moore 和 Jeremy Seekings 重構了南非福利國家的歷史，強調了從種族隔離到後種族隔離的歷史轉變。面對 AIDS 和孤兒等的問題，還有老人和兒童，國家是主要的照顧提供者，可是家庭、親屬、甚至市場都是南非照顧工作場域的重要因素。總之，這些文章呈現了多元的脈絡和結果，以及不同國家如何同樣把

照顧商品化的經驗。(註 1) ■

來信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註 1：對於這個的延伸討論與觀點，請見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20), "Sorge: Arbeit, Verhältnisse, Regime" [Care: Work, Relations, Regimes], 2014 (Brigitte Aulenbacher, Birgit Riegraf, Hildegard Theobald 編輯)。

> 在澳洲把照顧工作重構成為市場經濟

by Michael D. Fine,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澳洲, ISA老化研究委員會委員(RC11)



Past wearyin' or carin' ,
Past feelin' and despairin' ;
And now I only wish to be
Beyond all signs of carin'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pqht2Ph04>)

接連的幾任澳洲政府，包括勞動黨和自由國家黨，都為了尋求民眾的支持而聲明要去擴張社會照顧的服務。但是這個新自由主義和財政摺節的時代，他們採用了新的成長政策，因此也限制了非營利和公共照顧服務，助長了市場導向的照顧。服務使用者成為了「消費者」，有付費才有照顧。

幼兒教育中有很大一部份是非營利性質的，但在澳洲卻是一門產業。

Walzing Matilda 似乎是一首很鼓舞人的歌曲，是關於一個無家可歸的工人拎著自己的寢具（拎著行囊），然後邊找著頭路。這就是大家熟知典型的澳洲工人模樣，19世紀的時候工業化的畜牧業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另外一首經典的同期澳洲民謠是 Past Carin'，可以成為新時代的主題，因為重構的和市場化的照顧供給逐漸形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首歌以 Henry Lawson 的詩歌詞，是這樣唱的：

> 照顧：社會學的診斷

我們知道照顧是人類一生的基本需要。可是對於照顧的理解仍然是個學科的盲點。從最基本的國際或是跨國文化比較可以知道，一個社會的照顧組織原則反應了該社會的運作方式。分析照顧因此可以提供一個強大的社會診斷，也是一種理解社會關係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最脆弱群體，以及一個社會的結構和權力體系。

雖然女人已經被期待去

>>

提供家庭內的無償照顧，但是 20 世紀照顧的重要性已經超越家庭的範圍了。當女性的就業率提高之後，對於照顧的需求也增加了。澳洲的政府和其他國家很像，也為了回應這樣的需求而開始提供有償和正式的照顧。

儘管經濟的變遷，澳洲已經很大的程度上擴張了照顧的供給，並且在組織、經費、供給上都有很大的變化。這些變遷涵蓋了許多領域，從嬰兒的照顧到兒童的照顧，從殘障的支持到老人照護。雖然每個部門都有特別之處，但是這些特殊之處不應該遮蔽了更大的結構轉變，或是遮蔽了相同的機制。因為這些機制可以解釋政府和市場對於照顧需求的回應。

► 老人和殘疾照顧的改革

澳洲的老人照顧的變化被對於增加的需求所做出的回應所影響甚大，那包括了公共的成本。這個變遷奠基在以 50 年為藍圖的改革方案上，而且也試著改變整個系統的主要元素，並且所有層級的照顧費用都提高了。而對於市場的機制也愈益依賴，這鼓勵了私人的營利照顧提供者去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不像早期的方案，新的家庭支持方案是全國性的，並且各州差異很小。澳洲的殘疾照顧改革也採用了全國性的措施，也是為了回應增加的殘疾人口，同時也是出於人道的考量，縮小不平等的差距。

像是在老人的改革方案

中，個體的給付（消費者導向的照顧方法）讓受照顧者可以掌控自己所購買的服務，這是一種對於殘疾和有知識能力障礙的照顧者來說特別有吸引力的方案，因為這些人其實還是依賴家庭照顧，通常是母親或是年長的父母。

在這兩個方案中，用現金支付取代照顧服務為的是發展出一種服務市場和推動營利服務。這也增加了彈性就業，對於勞動環境但公共的非營利服務影響相當大。

► 照顧兒童

澳大利亞被公認是第一個在 70 和 80 年代就實行國家兒童照顧政策的英語系國家。照顧提供者一開始都是非營利機構，但是 90 年代營利機構開始引進。而資金系統是一種資格審核的補助與管理機制，最後卻沒有辦法和上漲的費用並駕齊驅，使得許多家庭無法使用兒童照顧服務。後來的自由派政府引進了改革，重新分配既有的資源、增加供給，但是補助大多是給女性的就業者。

上述的每一個方案都用正式給付的服務取代家庭照顧。另外一個被除了美國之外的所有 OECD 國家使用的方是公家補助父親的育嬰假。國家層級的方案最後在 2011 年引進澳洲，但是幾年後又被換掉，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限制資格的條件，排除那些本來就可以取得勞動資源的那些人。

新照顧典範的挑戰

早期的福利國家對於家庭增加的照顧需求是訴諸於家庭有限的照顧能力，以及認為市場是失靈的。今日，政治人物尋求開創一個另外的照顧體系，是以被規範的、國家支持的市場為基礎的照顧模式。在澳洲不同了規範市場的興起會讓政府的成本減少，因為取代了公共資金而已資格審查的方式讓家庭去負擔成本，並且透過低薪的營利照顧事業機制讓整體變得「有效率」。雖然這個方式有些吸引力，好像增加了選擇性，可是也有問題，主要是對於照顧工作者和被照顧者的安全問題，因為許多的工作環境和前景其實是堪憂的。

對於社會學家來說，這樣的挑戰是很重要的。若要超越理論，我們必須也理解這些新照顧系統的運作，同時不但要對於照顧提供、付費、忠誠、動機等的結果做出紀錄和分析，也要對這個領域的勞動就業提出觀察和診斷。■

來信給 Michael D. Fine
<michael.fine@mq.edu.au>

> 長期照護

瑞典和日本的比較

by Hildegard Theobald, University of Vechta, 德國, ISA老化研究委員會委員(RC11)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 (RC19)
、Yayoi Saito, Osaka University, 日本



日本的人口急速老化。Pia Kieninger攝影。

從1980年開始，西方國家的長期照顧政策已經有了很大的結構轉變，也對照顧工作者和照顧使用者產生很大的影響。許多國家都從彼此的政策經驗中借鏡。雖然在日本和瑞典的長期照顧方案是在不同的福利系統架構下產生了，家庭責任的觀點，也就是瑞典的長期照顧取徑，也在日本的長期照顧系統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瑞典，早在1960年代就有了全面的公共服務，主要是對於年長者的社會照顧，並且逐漸擴張。後來在1982被社會服務法所正式規範進去。而法律規範了普遍的取用照顧服務的權利，也讓地方政府有責任去確定有需要者確實受到照顧，不過這個法律也缺少了細節去明定

可使用資源的資格為何。從1980年代開始，財務的限制和人口的變化讓公共照顧的涵蓋範圍已經降低不少，因為持續的增加去滿足需求者的照顧需求。2012年有65%的65歲以上的老人使用公共住宅照顧服務，而5%住在照顧的社區裡面。可是，若從一個國際的觀點來看，那些公共照顧的涵蓋範圍仍然很大，私人的卻只佔5%。

在日本，老人的公共照顧也在1960年開始，但是只限於獨居老人，並且是需要審核的。對於家庭責任的強調和限縮的社會權利限制了居家照顧的服務。從1989年開始，「10年推動老人照顧和福利計畫」(金計畫)給了以稅為基礎的居家照顧服務有了都市的規模，這主要是照

著瑞典的地方公共服務典範去實行的。可是，在擴大居家照顧這方面是有困難的，而且有限的都市資源和日本人對於增稅的批判態度，這些因素的都導致了長期照顧保險(LTCI)於2000年產生。這混合了稅和社會保險的財務方案。在LTCI的架構下，此方案讓居住照顧和居家照顧可以同時提供給非常需要和沒那麼需要的兩群人。這增加了受惠的人口。在2011年，幾乎有13%的65歲以上的人口有使用照顧服務，4.4%使用居家照顧，5.4%使用照顧中心，3%住在照顧社區。2015年4月，一個新的改革方案試著去鎖定最需要的那群人。這個改革增加了部份負擔金額，對收入高的老人從10%增加到20%。

雖然照顧服務已經被市場化了，但是瑞典和日本的照顧都還是有公部門的資金支持。1990年代瑞典的公共社區和居家照顧服務體系也開放給私人的營利或非營利機構來加入，可是消費者的選擇比較多是在都市的層級上。這些方案中，市區註冊了不同的公共或私人照顧提供者，然後消費者可以選擇。2012年為止，約有20%的居家照顧和社區照顧由營利的大公司所佔有。

在日本，LTCI開啟了市場化的照顧服務，透過公共、營利、非營利的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社區照顧服務還是只有公共或非營利的組織經營。而我市區政府則負責運作，確保財務和稅收，同時審核照顧提供者和額外稅收。有了LTCI的照顧服務拓展，營利的照顧公司從2000年的30%增加到了2012年的63%。

而這些在公共支持的轉變，以及照顧的基礎結構的擴張和市場導向的改革。照顧工作者的處境也變化很多，特別是對於那些居家照顧工作者。最近對於兩國這些人工作環境的調查揭露了高工作量和高表準化的工作內容。無論在

日本或是稅點，居家照顧工作者的工作都在很緊的規劃中被決定好的。在瑞典，公共長期照顧的式微、市場化的結構變等都讓工作者有很大的反彈與批評。在日本，照顧工作者從來沒有對這樣的趨勢那麼負面評價過，因為照顧工作的擴張和公共的支持同時發生在市場化的時代。兩國都有超過40%的工作者想要辭職，顯示他們的不滿。日本的工作者的不滿可能來自工作量和低薪，而瑞典的結構性變遷則是不滿的原因。■

來信寄給Hildegard Theobald <hildegard.theobald@uni-vechta.de>

和Yayoi Saito <ysaito@hus.osaka-u.ac.jp>

> 奧地利和德國照顧工作的變遷

by Roland Atzmül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ISA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委員會委員(RC19);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ISA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委員(RC02), RC19委員, 工作社會學委員(RC30), 女性與社會委員會委員(RC32), 第三屆ISA論壇在地籌備委員會副主席(Vienna 2016); Almut Bachinger, 移民政策中心, Vienna, 奧地利; Fabienne Décieux,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Birgit Riegraf, University of Paderborn, 德國, RC02, RC19, RC30, 和RC32委員。



奧地利幼稚園的典型景象。Arbeiterkammer Oberösterreich, Austria攝影。

奧地利和德國是兩個西歐的經濟強權，也是兩個保守的社會福利國家，現在正在經歷結構重

組。兩者都要面對照顧和照顧工作增加的需求、責任、成本，特別是老人和兒童。兩國也都在家庭和專業場域到了這樣的挑

>>



五月一日是隱形勞動的一天！知名德國演員雕像穿著象徵了看不見的勞動。Ida Schumacher。Birgit Erbe攝影。

戰。

>移民工的爆炸

多數的德國和奧地利的照顧工作是有家庭的女性無償負擔的。雖然女性勞動力參與的增加讓家庭不再只有固定的模式，政府的現金照顧政策也把目標放在維持整個系統，透過動機和稅收來維持。兩國的移民女性通常的工作都是3C：清潔、照顧、烹飪。這個系統讓傳統的性別分工依然存在，並且讓公部門的責任負擔變小。

兩國的邊界、東西邊收入的差異、以及擁有龐大的東歐工作人口，這鼓勵了移民女性的就業。為了要管制所謂的24小時照顧，奧地利選擇合法化這種家庭工作。德國則是包括了合法、半合法、非法的工作者。奧地利因為政

治和經費上收到支持，以及德國非正式的允許，和被照顧者居住在一起的照顧工作已經被建立了，並且出現短缺的情況。24小時的待命和很大的責任，加上社會孤立和低薪，這形塑了移民女性的工作樣貌。

在兩國，福利國家體制的協助下，中產階級家庭可以使用得起照顧資源。東歐國家則有供給的瓶頸，特別是那些移民女性的家庭成員有照顧需要的時候更是如此。女性移民通常會在兩個家庭內工作，並且通勤，往返工作國家和母國。

>公部門的照顧工作

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擲節政策實行之後，專業的老人與兒童照顧工作變成了壓力很大的

職業，部份是因為新的私人公司開始去削價競爭。此外，新公共管理的所謂的理性和重組的模式也讓那些工作環境和工作流程要變得更有效率，但這會傷害品質。對老人照顧來說，不規律的工作排程讓心理或是身體的支持沒有辦法達成，對於幼稚園來說，高品質的照顧也被遭的環境和大班級所抵銷了。

老人和幼兒照顧的領域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無法罷工的，因為工作者不願意讓被照顧者被丟下。但是這樣情況已經改變了，德國的幼稚園老師最近正在罷工，因為工作環境太差、薪水太低、地位太低。類似的罷工也發生在2009年的奧地利：「幼稚園集體反抗」(Kollektiv Kindertagenaufstand)。這樣的罷工無非是為了爭取

>>

更好的工作待遇。

此外，工會也支持罷工，這是一種出現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新型集體行動。組織像是Care Mob, Care Revolution, Care Manifesto等等都結合了政治需求和對於照顧工作組織的批判，批判資本主義和訴求更美好的生活。

同時，照顧工作領域的理性化也和社會極化與新的勞動分工一起展開，例如在照顧管理和照顧提供者之間的分歧也帶來了可能的分化。

>另一種照顧概念

最後，有些新的方案被提出來要去面對社會越來越多的照顧需求，同時提供適合的照顧工作組織。在地管理的社區照顧已經從1990年代開始成立，主要是提供有別於家庭護理和居家照顧的模式。

地方的照顧社區主要是由家庭成員所運作，這

些人透過移動式的照顧服務來提供照顧。這樣的方式是以家庭照顧為藍本，然後變成有償勞動。許多的例子是中產階級，提供了技術和機會去執行專業工作，但是有限的薪資也讓雇傭關係變得緊張，有資格的人只做兼差的時數，而那些主要是女性移民的受雇者則負擔最技術的部份。雖然這樣處理的低薪和低社會地位的問題，但是也反應了這個工作是需要合法化保障的。

>照顧工作作為競爭場域

這些發展反應了兩極化的影響，並且和西歐的福利國家體系重組有關。後者尚未被擰節政策所影響。而重組的福利國家制度也要求它們要更有生產力，促進經濟成長，提高國際競爭力。一方面，所謂的「不具生產力」的支出也導致了非正式的族群化照顧服務分配的階層化。另一方面，服從經濟法則的福利分配也讓照顧

工作被經濟競爭和未來職業投資的邏輯所影響。可是，我們的例子顯示了個人照顧、高品質工作、社會團結的降低是和照顧工作的組織方式有關的。並且這些例子也顯示了從福利國家都投資型國家的路徑激起不滿的聲浪，尋求組織照顧工作者和被照顧者，這這個領域變得更加競爭。■

來信寄給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和

Birgit Riegraf <briegraf@mail.uni-paderborn.de>

> 危險環境下的 家庭照顧

智利、哥斯大黎加、西班牙

by Monica Budowski, University of Fribourg, 瑞士, ISA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委員 (RC02), 貧窮、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RC19), 和社會指標研究委員會委員(RC55); Sebastian Schief, University of Fribourg, 瑞士; W. Daniel Vera Roja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Valparaiso, 智利(註1)



在哥斯大黎加的危險景象。W. Daniel Vera Rojas攝影。

不同社會用不同的方式組織照顧工作。家庭和其成員，特別是女人，提供了大部分的照顧。但是，照顧的組織也仰賴於國家提供的服務、可購買的服務、和社區支持。我們的研究要問福利體系的組織原則如何形塑了智利、哥斯大黎加、西班牙等的照顧工作現況。

智利的社會福利體系原則是自由主義的，他們強調市場和個人責任。因此，我們期望家庭可以為一個單位去處理照顧議題，若有買得起的市場福利，那就依賴於性別化的家務分工。

哥斯大黎加的原則是社會民主，國家政策至關重大，家庭都會仰賴國家的服務和方案。西班牙則是結合了許多保守的原則，像是國家委派照顧服務給家庭（通常是女人），然後保護那些有工作的人（通常是男人）。所以在西班牙，兒童照顧是由家庭所負責，只有一些國家政策或是社區、朋友的幫助。而三個國家中，家務的性別化分工都是照顧提供的核心。當然，持續的經濟危機也都是重要的因素。

> 在危險的家庭中照顧兒童

>>

對於所有三個國家的經濟弱勢群體（在貧窮線上一點，有變成貧窮人口的風險），我們都問他們每一戶人家問題。這樣的家戶並沒有被社會政策所照顧到，可是他們卻也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去把照顧工作委託其他照顧者，像是送孩子到托兒所。而在 2008 年和 2010 年之間，我們訪問了在 3 個城市的這群人口，每個國家的城市大概有 24-31 個家庭，目的是去探討這些家庭成員怎麼處理照顧的問題。

可接受的幼兒照顧有賴於家長，或是非正式、無償的家庭支持，以及付費的幼兒照顧服務。私人（受補助的）的正式兒童照顧是在被認為對於兒童發展有利時才會被考慮，或是兩個家長的收入可以支持這樣的付費服務。受訪者對於勞動市場於照顧工作中的利益是很曖昧的，像是長工時，差的工作環境、低薪、暫時受雇等等，這些都是不好的點，對於收入、安全、認同來說，也都相互抵銷了。許多的受訪者這說道傳統的性別化勞動分工以及廣被接受的「母職」，造成了工作和照顧之間的緊張。市場、國家、或是公民社會都沒有沒辦法消解。

哥斯大黎加的家庭受訪者是在我們探討性別和代間勞動分工的對象。工作和兒童照顧是一種在家庭內女性代間的協商，並且總是以誰有比較多的收入為基準。有些女人非正式會付錢給照顧者。若有女人想要做全職的工作，其他的家庭成員不論是失業或是有兼差的，像是阿媽、親家姊妹等，就會提供照顧。若需要家庭外的照顧，那麼受訪者相信國家和勞動市場可以填補這個空缺。哥國的勞動市場似乎有比較少的壓力或是沒那麼複雜，特別是比較智利和西班牙之後。可是，男人基本上似乎比較少和照顧工作有關，女人也不認為他們有什麼貢獻。

在西班牙的家庭，女人把照顧工作一間扛起。經濟危機讓工作機會變少，也削減的公共照顧服務的支出。其他的安全網則很少。在我們的受訪者中，很少女人有小孩。而有小孩的女性則是批判性別化的勞動力分工，也抱怨有限的工作機會和可負擔得起公共照顧服務。某些原因是由於經濟危機。而熟人或是社區這時就會成為資源。許多受訪者不生小孩就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性別化分工不平等。

► 國家的比較

這樣在不同國家經濟弱勢家庭的照顧比較主要有兩個重點。第一，其強調了家庭對於照顧工作的重要，以及性別化的家庭間和代間照

的照顧工作性質。第二，這計畫也強調了福利體制對於家庭照顧工作的重要性。

對於多數的經濟弱勢家庭來說，性別化勞動市場，以及家庭組成和大小，這些都是兒童照顧的主要影響條件。不論這些性別化的角色被社會接受或質疑，也不論收入的機會或是國家支持是否存在，這些都會影響兒童照顧。哥國家庭導向的政策提供了建構三代家庭的成因，讓照顧工作輕鬆些。智利則是在勞動條件、工作機會、照顧服務之間存在著緊張。在西班牙，有比較少或是沒有小孩的家庭會減少女人的負擔。同時，經濟危機也減少了工作機會和照顧服務，所以女人只好一肩扛起。

照顧工作在哥國是比較壓力沒那麼大的，因為女性的家庭成員可以分擔做。智利的勞動條件、公共或私人照顧服務的缺乏，還有勞動性別化和傳統性別意識形態讓照顧工作變得困難。在西班牙，兒童照顧是壓力最大的，是因為性別化勞動市場的不公平和經濟危機導致的照顧服務短缺，以及工作缺乏所導致。■

來信寄給 Monica Budowski <monica.budowski@unifr.ch>

註 1：瑞士的國科會補助了這項計畫。University of Fribourg（瑞士）和 Public University of Pamplona（西班牙）、Catholic University of Temuco（智利），以及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哥斯大黎加）一起合作這項計畫。

> 南非照顧工作的限制

by Elena Moor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nd Jeremy Seeking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南非, 前 ISA 區域都市發
委院會副會長(RC21)和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委員會委員(RC19)

在南非，高層的經濟補助和身體照顧是需要的，也被提供了。那些失業、貧窮、AIDS 的大量人口代表了南非 5 千萬人口之中有 3/4 需要照顧和經濟的支援，這包括了大約 2 千萬的小孩，3 百萬的老人，1 百萬殘疾壯年，以及 1 千 2 百萬的失業人口。

早在 1920 年代，南非開始建構福利體系，但是只給白人，這是以英國的稅制系統、社會救助、照顧等為基礎的，著重在「需要」的社會類別，像是女人和小孩。在南非，需要的合格公民定義是種族化的：南非的「非洲人」或是「黑人」人口是被排除的，不能擁有福利和社會公民身份，也沒有投票權的政治權利。對於什麼樣的工作是非周人可作的和什麼地區是他們可以居住的劃分也是在強化種族遷移勞動系統，讓許多勞工階級家長必須離開小孩工作，小孩則給阿公阿媽帶。到了 1970 年代之後，經濟成長和政治穩定讓種族隔離的社會慢慢開始把資源給有色人種，這個改變讓照顧體系比較包容，到了第一次民主選舉 (1994) 之後完成。

公共政策的去種族化，特別是社會補助方案、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等，讓福利國家變大且變得重分配化。這個福利國家是沿著市場成長和親屬關係所存在著的。

許多小孩仍然和繼父母的家庭同住，3 個人之中只有 1 個南非小孩和親生父親住在一起，而大約有 5.5 百萬的小孩並沒有和親生父母同住。親人其實在照顧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時，勞動力的女性化和變遷的親屬關係也會導致市場照顧服務的增加。大約 3-4 的歲小孩中有 30% 是到私

人照顧或是幼兒中心的。

國家提供了小學兒童照顧，也補助家長 (繼父母也包括)，然後，在 2000 年早期，學齡前托兒所擴張了。現金補助的方案從補貼和成本的角度來說很特別 (和 GDP 有關)，甚至在比較巴西的 Bolsa Familia 方案時也是很特別的。

國家對於老人的支持主要透過老人年金。超過 1% 的 GDP 會分配給大概 3 百萬領年金的人。而老人年金是要透過經濟情況調查的，但是收入和財產的門檻也都很高，所以達到排富的效果。而後種族隔離時代政府對於老人的財務補助的擴張也和公共老人照顧的提供是有所衝突的。直接 (國家經營的老人之家) 和間接 (受補助的老人之家) 的老人照顧服務在民主轉型過程中並沒有留下來。而老人年金就對於照顧和家庭經濟補助的政策有所影響，因為老人年金很多錢，有 3/4 的老人和有工作的成年人住一起，然而只有一些人和小孩住，沒和有工作的人住。雖然老人財務上會支持年輕人，但是年輕的家庭成員卻沒有太多時間照顧老人。

壯年時期生病和殘疾的人口，大約有一百萬人，他們領取殘廢補助。AIDS 增加了工作年齡殘疾的人數，這些人也要經濟和身體的治療。質化研究指出了 AIDS 受到親屬的限制，所以不論住得遠近，其實都不適合求助。親屬照顧也持續是被性別化的，AIDS 則惡化此一現象。

南非提供了少數的公共支援給那些失業者。沒有國家的支持，也沒有能力透過市場取得服務，這些失業者只好依賴親屬。但是親屬的支持不再無條件的。而理想的

「不像北方的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制度，南非的社會協助計畫比較普及。」

結合與給定的親屬關係，也就是 40 多年前人類學家 Meyer Fortes 所描述的那樣，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不論近的或遠的親戚，南非人民會區分有利與沒有利的親屬。

南非的福利和照顧系統展現了和北方自由福利體系的某種相似性。國家的資源被導向社會扶助方案，著重在那些窮人上面。而國家也鼓勵擴張的市場提供照顧，並透過年金、健保、私人看護等的管道取得服務。

然而不像北方的自由福利制度，南非的社會支援服務可以觸及到更多的人。幾乎三分之一的成人和小孩接受了這種福利，而三分之二的和家庭住一起的人有得到福利補助。所以這種福利補助可以觸及約一半的南非家庭，包括了多數的貧窮人家。所以，這個制度很像北方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一樣。

當雖然親屬關係在改變，而且支持也影響著個人的行為和態度，許多南非人民仍然依靠家裡面的人來支持財務狀況和身體照顧。這個意義上，南非和家庭為導向的南歐社會福利是很像的。

再過去幾十年來社會福利的去種族化和親屬支援的改變已經讓南非的社會福利體制成了更加民主了，但是國家從原本身體照顧（給老人長者）的限制性的角色撤退了，讓人們要去依賴親屬，以及越來越依賴市場。■

來信寄給 Elena Moore <elena.moore@uct.ac.za> 和 Jeremy Seekings <jeremy.seekings@gmail.com>

> 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的社會學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St. Petersburg Public Sociology Lab的成員。上列，從左到右：Maksim Alyukov, Kseniya Ermoshina, Svetlana Erpyleva, Ilya Matveev; 下列，從左到右：Andrey Nevsky, Natalya Savelyeva, Dilyara Valeeva, Oleg Zhuravlev.

公共社會學實驗室是一個獨立的研究組織，由 St. Petersburg 左派學者和運動者所組成。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參加了學生抗議教育商品化的活動，也參加了反對在 2007-2008 年 Moscow State 大學的社會系的貪污和對科學的不敬，而其他則參加了左派的政治和藝術的結社活動，並在不同的大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在 2011 年，我們決定組織一個學者的社團，研究政治抗議行動，在 2011-2012 年做了一個大規模關於「公平選舉」運動的研究之後，我們開始研究在 Kyiv 的 Ukrainian Maidan 和 Anti-Maidan 的運動，並和獨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http://cistr.ru/en/>)(CISR) 合作。這裡我們主要聚焦在三個議題上。首先，我們要談談我們計畫的發展脈絡。第二，所謂的投身「公共社會學」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第三，我們活動面臨到的制度限制，以及怎麼克服。

> 俄羅斯社會學：在工具主義和專業主義之間

在我們的專業社會化過程之中，三種共識形成了，導致了兩種社會學知識的類別：工具主義和專業主義。第一個的代表是科學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其並沒有結構性的自主性，

是政治效忠者的歸宿，而且那些社會學系所被大學管理階層策略地私有化了。在這些機構之中，學者必須處理市場的邏輯，像是為了商業需要而做研究，並且販售學位，或是參加一些偽科學的研究，像是「中產階級研究」、「轉型」、「俄羅斯的艱難時代」等等。

對於「官方」或是「工具」社會學的反應，一個「自主主義」的分支正在形成，他們認為「真正」的專業社會學不應該帶入政治信念。從這個觀點來說，工具社會學的兩種形式都不是專業，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缺少了 Bourdieu 所說的自主性，也因為他們對於顧客的承諾使得他們無法專業。

我們對於工具主義的反對是一種對抗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社會系政策的平台，但我們也不同意去政治化的「專業人士」。和那些通常比學者更有反身性的運動者的合作，讓我們從教條和精英的觀點走開，也從方法論的教條走開了。社會學家 Victor Vakhshayn 是一個非常堅持「學術自主性」的人，他認為「俄羅斯的社會學語言已經被『新蘇維埃』和『反蘇維埃』語言所取代。而且，對於俄國社會學來說，建立一個「無信念」的科學是必要的（註

>>

1)。Vakhshtayn 把社會學的任務看成是「為知識而生產知識」。任何社會科學的政治化都是對科學理性的傷害。

我們相信，這個觀點並不是像是 Vakhshtayn 所說的一種對「價值無關」的信念。相反地，我們相信這個位置是意識形態的，也是對於後蘇維埃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來說最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展現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也是對於政治不滿的素樸反應，還有公共領域的污名化，以及證成了退縮到個人空間的行動。Vakhshtayn 的世代已經把這個「純知識」的理想從他的老師那裡繼承了過來，是一種進階的「布爾喬亞社會學批判」，對其來說慢像一個嚴謹的社會學知識是去判斷蘇聯帝國崩解的原因，而不是被任何深層對於無信念的啟法所引導的。他們把社會學看成是社會自我實現化的工具。可是，在去政治化的脈絡之下，這個理論深度的理想被轉化成了「純知識」崇拜。

當俄羅斯社會開始在 2011-2012 年反 Putin、烏克蘭戰爭和動員期間政治化的時候，專業社會學家也把目光轉到抗議事件上面。然而，若沒有科學的反身性反省，那只會再生產意識形態廢話、或是硬把抗議的經驗塞到理論的框框之中。

▷ 公共社會學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若是專業主義教師的世代是被 1980 年的悲劇社會變遷經驗所啟發的，而且若是「專業」也是被社會的在問題、退縮到私人領域，那麼去政治化本身成為了一種存在問題，特別是當我們的朋友，也就是科學的環境和社會批評我們的行動的時候，特別是如此。所以那是我們為什麼研究去政治化的原因。其架構是去了解公私領域的變遷關係。

此外，公共領域的研究也讓我們和那些被研究討論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那些浮現的公眾們。所以，我們現在規劃了一個會議，和在地的運動團體（主要是 2011-2012 年出現的那些）一起，交給他們我們的計畫，希望可以引起一些討論，建立網絡。

我們相信社會和政治問題是需要有新的社會理論的視野的。我們可以在不了解 anomie 這個概念的前提之下而了解涂爾幹的作品嗎？我們可以探索更多 Arendt、Habermas、Fraser、Negt、Kluge 等人的公共性理論，但卻沒有先注意私領域的貧窮現象嗎？我們的宣言說：「我

們實驗室的首要目標是去整合專業的社會研究方法和公共介入。而我們公共社會學實驗室所提出的科學的問題是和社會問題相關的，連結到俄羅斯的政治處境和世界其他地方。此外，本實驗室的任務也要結合社會介入和公民責任，具有理論和存在的深度，並透過經驗研究去解決宏大理論的問題。例如，政治動員的研究讓我們可以提出孤獨與團結、個人主義與團結等問題。」

▷ 俄國的公共社會學阻礙

但是這樣的位置在俄國很容易拿到嗎？我想還是有些阻礙威脅著我們這個計畫的生存。我們在專業主義和工具主義之間困住了，也在大學和市場之間被困住了。科學的機構，不論是中央級的研究院，或是先進的小型大學，都開啟出了一種嚴格的階層和職業節奏，可以自我再生產。這樣的邏輯讓合作和團結無法開展，因為研究者被原子化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CISR 找到立足點，而且是俄羅斯最獨立、草根、專業的社會學中心。獎勵市場也在快速委縮，這是因為國家對於異議學者的壓迫。例如，我們 The Politics of the Apolitical（致力於 2011-2012 年的抗議活動）的出版讓政府想要把我們定位成「外國機構」。

所以，今天我們面臨了更敵意的環境。目前我們已經依賴內部強大的道德和政治共識，但這是有限的。並且也依賴連結，依賴非正式的領導。可是，這些都還不夠。我相信我們必須開一個「國際」的學者和藝術家社群，可以聯合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到，從在地走向世界。

來信寄給公共社會學實驗室
<publicsociologylab@gmail.com>

註 1：請見全球對話 2.3 期的 V. Vakhshtayn's 和 2.5 期的 N.V. Romanovsky and Zh.T. Toshchenko 的回應。

> 早期蘇維埃建築中的 社會主義理想

by Natalia Tregubova and Valentin Starikov,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俄羅斯

在俄國，「蘇維埃」這個字意謂著1)組織、結社、委員會；2)指導、推薦、建議；3)和諧、一致。作為一個詞，其代表了一種特別的政治組織型態，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後引進，並且激進地轉變了政治權力：「工人、農民、軍人代表的委員會」也被看成「蘇維埃」。

蘇維埃被想像成是一個治理的主體，並且由那些「勞動者」所選出了，而每一件事情都在集體的決策決定上開始。在蘇維埃早期時代，這些「蘇維埃」是被設計用來進行直接民主的。他們體現了社會生活的新原則：團結、集體、自主。但是在同時，這些原則是以前被壓迫階級的「獨裁」上為基礎的。

這個新的社會性需要一種新的日常生活的新形式，不論在城市或是鄉村都是，也就是說，都是以工人或是農民的日常生活為主。大眾教育和文化教育、城市移民、婦女解放、新政府形式，這些過程都要被鑲嵌到日常生活中，並包括了空間組織。

這對於建築師來說算是提出了一個相當有利的挑戰，因為他們要去發明一種新的建造的形式和類別。因此，全球著名的蘇維埃建構主義前衛建築師在20和30年

代被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現實所帶了進來。

一個最大和最完美的建構主義計畫在現在仍然看得到，是一個在St. Petersburg的Narvskaya Zastava區的一個住宅區。那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的工人階級郊區。Narvskaya Zastava有一件悲劇發生過，叫做「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就是1905年和平的工人抗議被俄帝所鎮壓，而1917年的革命之後，這個事件被典範化了，變成了新無產階級意識型態的神聖印記。(圖1)

Narvskaya Zastava變成了建築的試驗場，而且成了工業地帶的一個大型公共中心。

Traktornaya街的住宅建築(1925-27年所建造的)就是一個當時的優先建築，那時候的建築師試著去找新的空間組織的原則，同時也建造公共住宅給無產階級。Traktornaya街是一個轉變型態的建築和城市規劃的例子，因為那包括了俄國新古典主義和新前衛主義的混合，而在Traktornaya街開始展開了整個轉變。(圖2)

而第一個在列寧格勒時代的中學在1927設立，名字叫做革命週年紀念學校，是一所實驗學校，採用新的學習和訓練方式，讓學生可以主動和自主，減少老師的數量。而學校有1000名學生，

包括了各種教室、實驗室、甚至觀星台。(圖3)

這個新的建築繼承了功能主義的想法，注重公共場所的重要性。而第一個大型計畫由工會運動所執行，那就是社區中心(1925-27)。社區中心提供了工人階級聚會的場所，包括劇院、教室、運動場、圖書館。1930-32年的時候社區中心擴張到包括了職業訓練學校，提供工人和年輕人機會去增進專業技巧。(圖4)

Narvskaya Zastava複合區域的中心是百貨公司和餐廳(1929-31)。這些新的設施是設計去提供大量供給的快速可吃的食物和半成品食物用的(別和20世紀晚期的速食店搞混了!)建築物的組合顯示了日常生活的動態一面，大的形式、不同的形狀、垂直和水平交會的線等等。而大的玻璃百貨公司是從接上可看到的，是一種激進公開、解放、團結的宣示，更是早期蘇維埃意識形態的中心。(圖5)

這個特殊的建構主義集合是在Kirov區蘇維埃(1930-1935)的建築物蓋好的時候一起完成的，包括了市政會議廳。一個有權力和民主的地方政府的這種想法對於蘇維埃的政治組織與論述在1920年代是相當核心的一部分。從很遠的地方就看得得到，這個行政中心容納了區政府、文化機構、銀行、郵

局、議會廳等等。而且，其使用了該時代相當創新的功能和科技。然而，同一個時間，這個Kirov區的蘇維埃可以被看成是蘇維埃前衛的消亡：其半古典的門廊與其他細部是現代帝國建築的特徵，並且擁抱新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圖6)

一些年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廣場就蓋在建築物的前面，特別適用來給大眾集會用的。1938年的時候，一個傳奇的列寧格勒共產黨領導人Sergei Kirov的銅像就放在這了。(圖7)

一個很大的紀念Kirov (

其1934年的暗殺是史達林蘇聯肅反運動到達高峰的前奏)的紀念碑代表了蘇維埃建築和社會的早期歷史的終結。而下個時代需要另外一種建築，推動了社會性的另外一種模式：大眾而非群體，集權統治而非人民民主，服從的消費主義而非團結。象徵上，一個容納1000人的大會堂變成了電影院。

今天，也是一個世紀多之後，Narvskaya Zastava地區仍然是一個工業地區，主要是工人在住的。而中學、社區中心、房子、Kirov區的蘇維埃建築保留了主要的

功能，但是作為社交和集體活動的這點來說，重要性減低了。建構主義的建築是被早期(帝國)的結構和晚期(史達林和晚期蘇維埃)之陰影所籠罩的，而且今日看起來還是相當古老的。(圖8)■

來信寄給Natalia Tregubova

[<natalya.tr@mail.ru>](mailto:natalya.tr@mail.ru)



圖1: 在Narva Gate的工人抗議，這在Bloody Sunday, 1905的前一天。有衛兵看守著。創作者不詳。



圖2: Tractornaya街道旁的住家。



圖3: 早期蘇維埃的學校，有天文台。



圖4: 早期蘇維埃的社區中心。



圖5: 早期蘇維埃的「吃飯工廠」。



圖6: Kirov District的蘇維埃。



圖7: 共產領導人的雕像：Sergei Kirov.



圖8: 在Narva Square的史達林主義建築。

所有的相片，除了第一張之外，都是由Natalia Tregubova和Valentin Starikov攝影。

> 幫傭移民作為成年禮

by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捷克



從1990年代開始，幫傭成為斯洛伐克女性移民的途徑。特殊的招募公司會找一個幫傭家庭，必且到London訓練。這是在London的Victoria Bus Terminal，要把完成的幫傭載走。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攝影。

「幫傭」把由移民的家務勞動和國內或國際之間的文化交流連結在一起。按照英國的2004-2005年的法律來說，幫傭都是年輕的移民，特別是那些和家人住在一起來兩年，而且是為了去學英文而找這個工作的。幫傭則被認為應該「和該家庭住一起」，接受食物、房間、零用錢（而非工資），

而該家庭則要把幫傭一視同仁。移民單位和組織都建議把他們當作自家人看待。

從1990早期開始，幫傭就成為了從後社會主義中歐和東歐的女性移民管道，特別是來自斯洛伐克的女性移民。而斯洛伐克也有密度最多的移民。媒體總是把幫傭描繪成是一種處理後社會主

>>

義轉型的經濟對策。在斯洛伐克，媒體每天都在報導，把經濟困苦、高青年失業率和幫傭連結在一起，但也把連結到幫傭會講外語和到國外旅行的這件事情上面。

然而 50 個斯洛伐克的幫傭訪談 (2004-2005 年於 London) 顯示了他們的動機並不能被化約成經濟策略而已。大體上來說，工作、賺錢、學英文的渴望是和其他個人議題交織在一起的，移民的決定是和家長、伴侶、朋友等息息相關的。若有人說她要當幫傭是因為要避免低薪的工廠工作，另外也有人會說她幫傭是因為剛經歷不堪的分手而無法和前伴侶繼續住在同一個地方。而幫傭的明顯經濟利益通常被更複雜和更隱微的動機所偽裝起來。總體說來，說是為了要去學英文會比說是要逃避一段關係或是家人還要簡單。

在遷徙之前，許多的斯洛伐克幫傭是和父母親住在一起的。她們的幫傭家庭提供了一個絕佳可以是她們獨立自主的管道，幫傭通常認為她們的幫傭期間是離開原生家庭和安定下來 (或是更希望成立自己的家庭)。她們把在國外的時間看成是一種冒險、試驗、享受的機會，並且不匯款回家，也從不被期待這麼做。她們賺到的錢都是私房錢，都用來享樂、趕時髦、參加派對、買禮物。許多人也把部份的收入存起來當作學英文用。許多人說在未來，她們會小心存錢，或是留給小孩。但現在，享樂是重要的，交友也是重要的，因為這是先進的消費文化一部份。

許多幫傭描述到這些實驗是一個更大計畫的一部分，他們待在國外，成為和家長獨立出來的個體，只依賴自己的經驗成為了成長和自我發展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課程。幫傭則時常比較他們和

軍隊的不同，在捷克，從軍是義務。對許多女性來說，幫傭是一種成年禮，讓他們準備好進入成年的獨立階段。

這樣的自我理解對於幫傭來說有重要的影響和結果，因為這助長了許多人去忍受那些壓迫的環境。而在幫傭和家庭主人之間的平等關係雖然被法律所鼓勵，但是實際上不可能，因為權力總是不對等的。的確，86 人中的 82 個被幫傭的家庭並沒有按照法律去做，被幫傭家庭時常要求超時工作，並且不付錢，或是忽略她們的自由時間與語言學習。有些幫傭更被期待要去和小孩子睡在同一個房間。

幫傭的移民身份、她們幫傭的家庭也是工作場所的這個事實，以及缺少語言的流利，加上妾身不明的位置，既非工人、也非客人、更非家人，這些都讓她們在協商的時候沒有權力去爭取更好的待遇。對許多的幫傭來說，若要離開一個很差的幫傭家庭，那麼就要面對三個很難的選擇：找到新的家庭、找到英國其他工作、或是回到斯洛伐克。

即使幫傭遭到不平等對待或是剝削，他們還是願意留下來，這種例子屢見不鮮。雖然有些幫傭提到了一些實際的理由，像是沒錢回去，沒有前景，並預設可以度過往後的難關。許多人描述到了在一個艱難的環境中待下來是代表一種成長，回去也並不會比較簡單。弔詭的是。結構的不平等和對於成長的信念減少了他們抗拒剝削的堅持，也就是說，對於個人成長的努力可能也導致了自我減權 (disempowerment)。

來信寄給 Zuzana Sekeráková Búriková
<burikova@fss.muni.cz>

> 在家教育 捷克教育的自由和限制

by Irena Kašparová,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捷克



在家上解剖學！Irena Kašparová攝影。

過去 20 年來，捷克的教育表現一直下滑，在許多的指標都是（如 PISA）。這個問題已經激起了國家對於教育的角色、方向、方法的辯論。大家不僅僅是不滿比較的標準，還包括了更大的社會議題，像是缺少義務教育之外選擇的自由，而父母親認為他們也不滿意主導的生活方式，也就工作和教育把父母和小孩在很早就分開了。

在共產時代之後，也就是個人主義被壓迫的年代以後，一些人開始認為個體應該對自己和家庭負責。後共產政府已經開啟了需多新的機會，包括的教育，於是在家教育出現了。

實踐上，捷克的在家教育有很多的不同面向，從不教育（小孩教育自己）到在家遵循官方課程大綱的方式都有。雖然有證據顯示過去 10 年來，捷克的父母越來越需求不同的教育選項，但還是很少數，不到 1%。

在共產時代（1947-1989），學生沒有選

擇，只能到公立學校去讀 9 年的書。沒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因此，幾乎所有的捷克父母親（30 歲以上）是在共產意識形態下受教育的，強調平等、相同、服從、一致。

對許多父母親來說，在家教育是一個新的東西，而且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有革命性的點子。在一些高教育程度的父母親的奔走遊說下，在家教育已經於 2005 年合法化了。

在新的法律下，父母有權利在家教育小孩，不過限制在小學（1 年級到 5 年級）。法律的限制包括了：扮演教育者的父母親必須擁有高中學歷、要有一封來自官方機構教育心理諮詢辦公室的信函。父母教師也必須解釋為什麼他們想要在家教小孩，而且也要顯示足夠的學習空間（合適的家具、環境、空間），而小朋友也要參加官方的學校考試，每年至少兩次。

法律提供了教育的自由，可是，同時也展現了國家想要控制教育自由的需求，能控制越多越好，他們藉由要求父母擁有文化和經濟的資本。而父母和小孩則必須歷經教育心理學辦公室的一連串測驗，這辦公室就像國家的守門員，有審核資格的權力。有些父母說他們為了要拿到證明，已經拜訪辦公室太多次了。

為什麼捷克的政府讓這個諮詢辦公室可以決定在家教育的命運呢？這個辦公室讓主流以外的教育選項越少越好，不支持在家教育，以個人因素拒絕申請者，忽視系統性的事實，特別是經濟資源的取得性。不像學校有資源分配給學生，教育者父母則沒有國家的資源去支持家具、書籍、材料、食物等。在家教育的父母至少有一人

不能有全職工作，所以只適用於負擔得起這種教育模式的家庭。

排除教育的概念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相當敏感的。過去的在家教育被描述成是排除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捷克的上貴族階級可以去私立學校，所以革命時代被認為是一種特權。而這種社會階級則在 1947 年革命之後分散在社會角落。新的政府認為在家教育是不需要的，因為人人接受平等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在共產主義之下，排除和在家教育有非常不同的意義。從革命之後的教育就非常注重一致性，容不下差異。小孩子若不服從權威，不論是身體或是心理上的，都不見容於主流教育體制之中。特殊的學校就是給那些不同的小孩的，包括了不同的族群，例如 Roma。若這些特殊學校沒辦法滿足，那就在家接受教育。在共產年代，那些在家教育的小孩是不幸的，社會容不下他們。

現在，教育部長已經拒絕任何中等教育以上的在家教育了。他的立場顯示了在家教育在捷克公眾眼中的曖昧性。雖然去中心化和自由化的國家的確提供了在家教育

的法律和社會基礎，但是其實踐層次上卻是非常選擇性的。即使法律提供了替代選項的可能，可是其還是取決於國家，因此也抵銷了可選擇性的自由。就像在共產時代，其實排除只是一種比較鬆國家管控，還是不可取的。而其本身來說，我們都留下了一個難題：國家開啟了包容的教育政策選項，容納在家教育，可是同時控管的機制還是控制著在家教育，還是在進行排除。■

來信寄給 Irena Kašparová <irenakasparova@seznam.cz>

> 記憶捷克的Roma工人

by Kateriň Sidiropulu Janku, Masaryk°University Brno, 捷克



在位於Prague的National Theatre Piazzeta的Roma工人展覽。Michal Heřovský攝影。

那天是2013年的5月15日，我們站在Olomouc的廣場上。這是一個位於Brno和Ostrava的城市，我們在這裡起草Roma工人記憶的計畫。那也是團隊的第一次相遇。超過10個人，來自學術屆、社區工人、老師等，一起圍個圈圈，相互認識彼此。我想沒有更好熟悉彼此的方式了，大家一起建立互信，然後一起工作。我們的目標是準備一個關於Slovak Roma工人的展覽，他們在戰後來到捷克，我們想要把這些人的回憶串連起來。

「當我們走在城市的角落，我總是問年輕的女子說我想知道『Khatar sal』（你從哪來？）」。因為我知道她們一定從某個地方來，並且家庭都在斯洛伐克，像我一樣」Bořena Dudi

Kořová說。她是社區的工人，也是一位Roma作家、運動者、工人的女兒。其父親從1952年的斯洛伐克和烏克蘭邊界進入捷克。其他人同意了展覽的名稱，而我也很開心看到相機紀錄到那一刻。

「你怎麼拼Khatar sal?」我問，因為我的Roma語很差。我只知道基本的詞彙，可以用來打招呼、表示尊敬。Roma語對我來說太複雜了。我上了5次課就不行了。Bořena拼了，並說：「但是我們應該把展覽稱作Khatar san嗎？因為用正式的詞來描述年長者是一種習慣。」

在2014年的9月8日，我正在讀我的開場演講稿，我坐在一個木質房屋模型的前面，

>>

外面是粗糙的，裡面則是捷克和 Roma 旗幟的顏色。大約有 50 人組成了群眾，其中一個人是警察，擅長處理極端主義，這或許是我們告訴了警察說我們要展覽，看看他們是否可以防範一些事情。我們其實不太知道會發生麼事。或是若有事情發生了，那是針對展覽？還是針對我們。而 Ostrava 中央行政中心則拒絕給我們放置展覽在主要廣場的許可，也不和我們討論。「難怪，」一位在 Ostrava-Vítkovice 的訪客說，「他們覺得他們有責任維護 Ostrava 的形象，不想讓其看起來像吉普賽。」

Vítkovice 的青年則有不同的觀點。「我很興奮我們有這個最新的文化形式，在 Ostrava 沒有其他人有。」

什麼是最大的驚奇？在展期的 5 周之中，沒有惡搞的行為發生。Roma 工人的家庭盛裝出席，並且觀看和聆聽他們親戚和鄰居的故事。一位流浪漢跟我們說謝謝，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經驗。年輕的路人也用新穎的科技，當代的打扮，但也會很緊張，特別是我們接近想要跟他們說話。年長者則記憶起了 1960 年代的 Roma 同事，鄰居、戀人等，而且所有許多 Roma 學生的小學校長，她並不識得 Roma 的旗幟，但也大方承認。

那是 2015 年 2 月 9 日，我收到了從捷克文化部寄來的電子郵件。文化部贊助了 Roma 工人記憶的計畫。我們照承諾所說的，展出了三次，但是每一次展覽都沒有超過兩個月，可是這個卻是贊助的前提。在 2014 年的春天，我全心全意想要達到兩個月的標準，可是遇到的阻礙，還有來自於政治的壓力，所以我只好撤退，假裝忘記了這個兩個月的要求。我被整個行政的程序搞得很頭大，包括了要得到一個空間就要 15 個核准，而且有時候溝通時整個很困惑和不友善。我已經得到了兩個團體願意贊助接

下來的展出，有一個獨立的國外收藏家看到了我們的展覽而且告訴我們他很欣賞，並且要求我們解釋那個回顧的電話是怎麼運作的，要怎麼撥打並且聆聽那些 Roma 工人的經驗敘事。

除了近一部展覽的興趣之外，那些也是對於族群關係、教育、對抗社會不平等、培力公民對話、處理「不合作自我」的年代裡的差異等等議題的理論反思的貢獻。我估計有 2500 人進來看過我們的展覽，而在窗外看的則有數百人？我們當然不會認為這些都是徒勞的！可是從應用科學的角度來說，我們卻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開始準備另外的展覽旅程。很幸運地，有一位支持者就在我們要關門的那一刻包下了所有的展覽品，他想要把這些作品放到他家鄉的公車站展示，那裡是一個工業中心，也是少數 Roma 戰後移民，從斯洛伐克而來，現在還留在那兒。1989 年之後的租金飆漲，許多 Roma 移民離開到邊緣的地區，這也是捷克城市的後社會主義常見景象之一。

創新應用的科學是最近幾年來遇到最滿意也最挫折的專業挑戰。■

來信寄給 Katerina Sidiropulu Jank

<katerinasj@fss.muni.cz>

> 形塑世界規模的社會科學

by Ercüment Çelik,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國, 勞工運動委員會(RC44)和社運、集體行動、社會變遷委員會(RC48)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GSP成員。New Delhi。Ercüment Çelik攝影。

在過去 20 年間，開創一個非霸權的世界規模社會科學已經成為了不論全球南方或北方的主要關懷。歐洲中心主義和全球南方社會學理論的興起已經產生了許多辯論，也看到了許多必須性還有機會，這對於邊陲和南方的國家可以透過相互學習和對話，社會科學家專業和公共之間的交流而得以可能。

而有 13 年歷史的全球研究計畫 (GSP) 可以為這樣的辯論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呢？首先，

GSP 是一個 2 年的社會科學碩士班，由許多大學一起合辦，包括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國；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後來改名為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南非；FLACSO, 阿根廷；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印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泰國。課程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勞動研究、國際關係、還有地理學。從 2002 年開始，超過 300 名學生，他們來自 60 個國家，一起參加了這個 GSP，每一位都參

>>

加了其中的 3 個學校。

透過這個國際的、跨學科的、跨文化的計畫，學生經驗了許多不同大學的傳統，包括教學和學習都是如此。他們也經驗了他們求學所在的社會，也重新看見了自己的社會。而最後的成果就是一個高品質的碩士學會，以及個人無可取代的寶貴生命經驗，包括了上述所說的，以及各種在全球社會科學為基礎上的價值。GSP 的經驗可以讓學生了解什麼是真正的「世界主義」，也就是跨文化的環境可以給予他們機會去學習更好的知識。不過這樣的激盪，學生發展出了了解、包容、肯任「他者」的能力？不可避免的是，GSP 已經變成了一個平台，在上面參加者發展和鞏固了 Ari Sitas 所說的「和解的倫理」，強調自願和合作，相互尊重。

而世界規模的社會科學實踐需要跨文化的能力，這不只是對學生來說如此，老師也是，行政人員也是。這些人都被期待要去對於來自不同國家、制度、工作文化等背景的學生的需要有更多的敏銳度。準備好去協助這些學生是這個社會科學計畫的一個核心面，這要鼓勵參加者去看到學生，不要看成是負擔，而是潛力。GSP 的老師也是在實踐「全球化公共」：有自信、社會的、跨文化的知識全球公民，他們將會構成我們這個全球連結的社會。

一個非霸權的相互學習應該是這個計畫的核心。一個人可以想像 GSP 在 4 個大陸上的合作的大學和每一個特殊的知識系統，從歐洲到全球南方，這對於全球連結的知識系統來說是多麼完美的架構。Raewyn Connell 說過在大城市的研究所是被科學專業規範所限制，而走向全球包容的知識制度則是挑戰。GSP 在 Freiburg 大學來說就面臨這個挑戰。然而。儘管存在著制度限制，學者都設計出許多方式去創造更包容的學生，課程像是「現代性爭論和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挑戰」，「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南方觀點」，「全球社會學的隱喻、詩學、敘事」，學生反應都很正面。來自北美、德國的學生寫的批判性文章顯示了他們的大學教育經驗如何成為歐美知識結構體系的一環，以及他們以前對於這樣的結構如何毫無所悉。

GSP 在學術工作和公共實踐之間的動態對話對於「公共社會學」來說是個貢獻。當我們重新造訪 GSP 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不同的大學之間，學生被鼓勵去從事田野調查，特別是

可以連結到社會核心問題的田野場域中去做田野。必須的實習經驗也讓她們參加到真正的工作和生活中，像是社運、NGO、社區組織、公會、學術、政治機構等等。用 Michael Burawoy 的話來說，「他們保留了和公民社會的連結」。學生成為了「有機」的 GSP 參加者。在許多案例之中，這些「公共」的參與發展出了學術工作和科學分析的素材和碩士論文的題目。GSP 提供了平台給公共、政策、批判、專業社會學，特別是專業和公共社會學之間的對話。

GSP 其中一個最大的限制是影響大學系統的市場。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對於學術人員來說日益增加的危險工作環境，這也損害了這個計畫的穩定性。特別是在德國。中級的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沒有工作保障，使得許多人即使有心想要做事，也得離開計畫。

另外的議題是在不同大學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Freiburg 大學有意無意地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未來我們期望合作的大學可以堅持平等的角色執行這個計畫。的確，平等的結構對於 GSP 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儘管有各種挑戰，GSP 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實踐經驗給了世界規模的社會科學，也鼓勵了向邊陲學習、實踐相互理解、並開啟了一個學術平台，社會學的想像可以和政治的想像結合。■

來信寄給 Ercüment Çelik <ercumentcelik@gmail.com>

> 全球視野下的專業主義

打開黑盒子¹

By Ellen Kuhlmann, Karolinska Institutet, 瑞典; Tuba Agartan, Providence College, 美國; Debby Bonnin, University of Pretoria, 南非; Javier Pablo Hermo,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Elena Iarskaia-Smirnova,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俄國; Monika Lengauer,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ortmund, 德國; Shaun Ruggunan,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南非; Virendra P. Singh, University of Allahabad, 印度; 所有作者都是ISA專業研究委員會成員(RC52)

全球化已經進行得相當徹底了，不管在範圍上或是實踐上，專業都被全球化了，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中。快速發展的市場像是BRICS(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南非)，以及其他中級收入的國家，也已經開創出專業領域的市場需求，不論在公共領域或是私領域都是如此，即使在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在質疑福利國家的原則，以及擲節政策也影響到了專義務的政府資金支柱，整個大體的趨勢仍然如此。

雖然國家一直是專業社會學討論中的核心概念，但是，社會學家鮮少發表對於地緣政治或是文化脈絡下的國家或是公民身份對於專業的看法。最近的研究比較注意到了全球化和跨國治理的脈絡、情境的跨國比較的領域，可是許多的討論還是只有看西方國家，對於全球南方和東方國家並不注意。

我們試圖去把既有的取徑翻轉過來，利用不同國家研究者的研究，包括南非、印度、阿根廷、俄國、土耳其、阿拉伯國家。雖然這樣缺少了共同的「參考單位」和超越「福利國家專業」，可是我們可以提供專業發展的圖像，並利用國家和專業作為一個整合主題為框架，去探討兩者的關係。

在阿拉伯國家，專業主義時常被描繪成一個普世的概念和目標。阿拉伯的專業人士(像是大學教授)討論專業價值，其方式和60、70年代的功能論有驚人的相似性，都是把特徵當作誠信或是社會責任、目標、和知識工作。同時，特徵也是西方功能論的關鍵，像是專業組織，及其目標、控制、壟斷等都不見了，這意味著普世的取徑可能會策略性地動員去建立專業領域，但是專業還是缺少了科學研究的紮實基礎，也沒有公共掌控和國家支持的具體機制。

在土耳其和俄羅斯，中央集權的國家限制

了專業群體和專業主義的範圍。在這裡，政策變遷在這兩個國家都重塑了國家和專業的關係，儘管分別透過不同的途徑。作為中級收入的國家，土耳其的新興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已經增加了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同時，從公共管理來的政策也試圖去控制專業領域。在健康領域這是相當明顯的趨勢。新的管理政策增加了對於醫生的控制，但是也開啟了醫療專業和國家之間新的連結關係：政府引進了新的管理位置給醫生，然而醫生這個職業也把管理整合到了醫學教育之中。

在俄國的1990年代，轉業裡面有幾次大變遷。例如，社會工作專業成立了，結合了新的評價系統，創造了一種新的訓練模式。雖然政府的低工資政策和性別化的社會工作文化限制了專業發展，新的市場驅動社會政治也推進的專業化：社工被要求去提供社會權利的取得和保證。結果，社工被整合到公共領域，而也受益於市場擴張。同時，社會工作者也缺乏定義自我認同的權力，也無法定位自己在市場化政策中的位置，而整個結構安排或許也轉變了和客戶的關係。

印度和南非正在歷經經濟成長，並且新興的全球權力和國家也建立了更多元的治理架構。專業發展被權力和殖民歷史所形塑，然後在兩個國家都是如此，自由福利國家的昂革魯薩克遜模式也導向了強大治理的專業模式，包括了掌控和取得都是如此。

在印度，法律專業是全球化的核心，也是國家規範的重點，包括了規範法律事務所的市場競爭，以及限制外國律師的取得。而印度和外國律師兩者都透過企業調查的新形式發展出了市場擴張的策略，印度並且變成了法律行業外包委外的目的地。這已經在IT產業和出版業發生很久了。這樣的專業也已經開創出了一種

「許多對於專業的討論仍然只有聚焦在西方，卻對於南方或東方相當忽視。」

精英專業的領域，然後侵蝕了法律專業的地位，無法和全球市場競爭。在這個精英場域，國家介入已經限制了重組專業的權力，這是由於全球企業政治所導致的後果。

南非的快速經濟成長也伴隨著專業主義和公共領域整合而形成了。後種族隔離政治包括了對於更包容的專業發展的強大需求。即使如此，專業仍然被性別、種族、族群不平等所形塑。在這裡，專業人士已經可以動員強大的自我治理能力、從國家分離出來，保留了職業的壟斷和掌控了專業領域的存取權力。再階層化、市場化、管理變化也已經延伸到了性別和種族不平等裡面了，儘管形式或法律以及國家支持的缺席，以及存在著新的用來推動包容的法律，情形仍然如此。最近的國家用來規範專業的介入，部份是國家轉型的計畫，可能挑戰了長久存在的職業壟斷，將機會大門敞開給以往被排除的社會群體。

最後，阿根廷的經濟成長也提供了社會服務的擴張，伴隨著越來越多元的治理。這裡，歷史上和歐洲很強的連結（特別是拉丁國家）形塑了公共領域的專業主義，這包括了新的高等教育跨國選項，特別是教育和研究所教育。專業群體也已經對於跨國市場做出了回應，透過創新的職業機會給專業人士，以及新的知識生產過程，還有技術認證。這樣的例子顯示了全球化和跨國主義的鞏固，以及強化專業主義作為一種變化的行動者和政策制定者。這不僅在國家的範圍是如此，在國際上也是。

我們的個案研究包括了許多的專業領域，從高等教育、法律、媒體、社會工作，到醫療。

雖然每個故事都是獨特的，並且仍然進行中，但是每個都是全球視野下專業變遷理論的絕佳經驗案例。■

來信寄給 Ellen Kuhlmann <ellen.kuhlmann@ki.se>

註 1：這是由 ISA 專業委員會 (RC52) 所撰寫的。更多的細節請參照 http://www.isa-sociology.org/pdfs/rc52_professions_in_world_perspective.pdf。

> 謝謝， Nacho !

by Izabela Barlinska, ISA執行秘書, Madrid, 西班牙



José Ignacio Reguera,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Nacho。

1987年的1月，有一個裝滿ISA檔案的箱子從Amsterdam到了Madrid，而ISA的秘書處展開了新生命。我們迫不及待地將箱子拆封，開始為ISA第七屆社會學世界大會做準備。在那時候，ISA只有2000名會員（今天則有6000人），整個大會的議程都是由打字機所打出來並傳真出去的。

而就是José Ignacio Reguera，我們都稱Na-

cho，他加入了我們。並且，工作了近30年。他現在決定要退休了。這三十個年頭以來，Nacho建立了整個會員資料庫，而到了網路時代，他也成為了ISA的第一個網站大師。謝謝你，Nacho！謝謝你為ISA的奉獻與付出，讓ISA從一個類似於家庭的辦公室，發展到現在這種現代國際規模的組織。■